海外移民:中国经济的绊脚石

正经历的中国第三次移民潮以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发达国家相对收入差距、移民门槛抬高,是中国移民输出高端化的外因,但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及政策调控风险才是中国移民流出的引爆点。

本版制图/张常春

穆启国

移民,这个以前仅在少数高端人群讨论的词眼,现在正与中国包括中产阶层在内更大范围的人群渐行渐近。世界银行每五年对各成员国净移民统计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净移民持续流出的态势未变,而且在数量上跃升了一个数量级至百万级别。2009年至2013年间,世行估计中国净移民输出150万人,位列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之后,排名第四位。

与以往历次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中国正经历的第三次移民潮成员分布在中高端技术人才、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净值人群。移民方式以技术移民为主,但投资移民正在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危机外因: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移民

收入的相对强弱仍是决定全球移民流向的重要因素。从全球净移民国家分布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国,而中国、印度、非洲、南美国家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高收入国家仍然对低收入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技术移民门槛提高、投资移民日渐兴盛是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新特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收入、福利、环境等优势,一方面以加、澳、新为代表提升技术移民门槛,筛选出素质较高的群体,以优化本国的人口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为缓解债务压力,逐步放开投资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净值人群,帮助经济复苏。由于忌惮对本国就业的冲击,对于低端劳动力则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这种政策设计对中国的冲击是严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拖累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低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和社保的压力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危机内因: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剧是引发跨国移民潮的内因。近年来,我国区域间的不平衡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区域间相对收入差距扩大使劳动力向发达省份聚集,欠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放缓—人口流失—需求下降—经济放缓”的恶性循环。2003年排名前五与后五省份人均GDP离差值是21023.8元,而2012年该离差值扩大至48557.8元,增长了230%!另一方面,发达省份,随着人口的集聚,资源瓶颈愈发突出,拥挤、污染等大城市病日益暴露。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区域失衡的加剧,引发政策调控的风险也在加强。其中,收入分配政策首当其冲,以房产税和遗产税为代表的资产性收入调整或将成为突破口。以上两方面使得高净值人群的归属感日益淡薄,移民倾向逐步加深。恰逢国外移民政策伸出橄榄枝,于是里应外合,一走了之。

存量漏出:移民加剧潜在产出下行

在增量要素逆转的背景下,移民带来存量要素漏出加剧了潜在产出下行。劳动力、资本、土地是三大基本生产要素。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开启,劳动力总量供给下降,结构问题突出;而国内储蓄也暴露出长期拐点,这些因素指向了廉价劳动力、资本供给时代也行将结束。这也是我国潜在产出拐点下行的重要依据。

经测算,现有情形下,每年高净值人群移民约拉低潜在产出0.5个百分点。根据此前述分析,本轮移民潮的主要群体是中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净值人群。后者一般指个人资产在600万—1000万以上的社会群体。根据《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记载,截至2012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了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的平均财富达到4900万人民币,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省份。调查显示,约有50%的高净值人群表示考虑投资移民,其中10%确定要投资移民。

按照300万高净值人群、平均财富5000万与投资移民比例10%计算,我国潜在财富漏出量是15万亿。考虑到平均年龄39岁,故按30年分布计算,每年财富漏出约0.5万亿。再考虑到制度套利因素,即取得国外身份后继续在国内经营,这部分比例按50%估计,因此每年的移民对中国财富的漏出量约为25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仅以金钱衡量的资本存量流出就占到当前GDP的0.5%左右。

印度经验:高技术移民致GDP净损失

相关数据显示,在印度,约有40%~50%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信息产业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美国。研究报告《高技术移民对印度的影响》中得出,每年从印度输出的高技术移民所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漏出间接使印度遭受相当于GDP 0.5%的净损失。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像印度这种服务业占比50%以上的国家,高技术人才大量流失将造成相关产业增速放缓。我们对比了印度净移民和电子与IT产业增速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从而印证了上述判断。目前没有找到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至少从印度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高端技术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出长期对经济负面影响、且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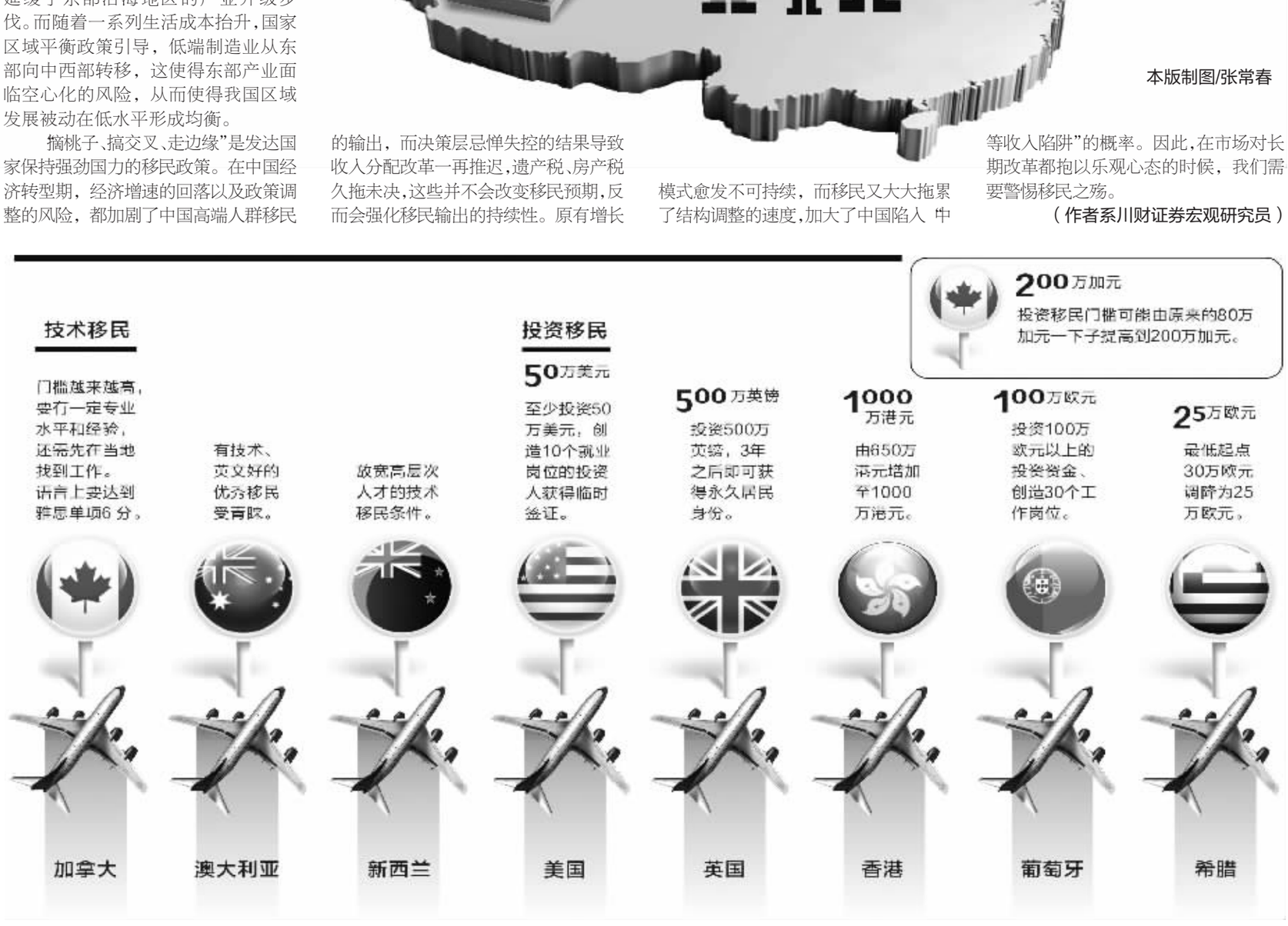
逆向而流:移民拖累产业结构升级

移民使得中高端人才流向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相逆,不利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服务业和高端制造行业的比重,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特别是要占据产业链附加值高端。这部分劳动参与者主要为具备卓越眼光的企业家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因此,高端人力资源投入成为经济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但高净值人群和技术人才的移民带来资本与人力的外流与结构调整的方向相逆。

移民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向低水平均衡靠拢。《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是进行产业结构分析有效的工具,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省份行业增加值的占比,从而得到对应省份产业结构特征。我们发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劳务输出大省甘肃为例,产业结构多集中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初级加工行业(农业、能源、矿产)。移民导致发达地区中高端人才流出,延缓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步伐。而随着一系列生活成本抬升,国家区域平衡政策引导,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这使得东部产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从而使得我国区域发展被动在低水平形成均衡。

“摘桃子、搞交叉、走边缘”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劲国力的移民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调整的风险,都加剧了中国高端人群移民的输出,而决策层忌惮失控的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遗产税、房产税久拖未决,这些并不会改变移民预期,反而会强化移民输出的持续性。原有增长模式愈发不可持续,而移民又大大拖累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因此,在市场对长期改革都抱以乐观心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移民之殇。

(作者系川财证券宏观研究员)



中国的两次移民潮

平遥老刘

我国是世界上移民到外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商业贸易、留学打工、政治逼害、远征战争和宗教信仰等原因,我国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向国外移民的行动。不过,比较大的移民潮在我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于清朝末年至解放前。这次移民的特点是劳动力的输出,而且是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战争使英法等国的劳动力十分短缺,他们便在中国山东等地招收了十万名青工赴欧洲各国劳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抗日,中国十万远征军开赴缅甸和印度等国参战;在日军逐步战领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先后抓走了大批中国青壮年送到日本去作劳役。在这些庞大的人群中,一些人因掉队、生病或其他原因留了下来,成为早期华侨的一部分。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青壮年,则是为了谋生和发展,纷纷到东南亚各国及美国旧金山等地打工或经商。一旦在当地站住脚或事业有成,便会把家属和亲朋好友也拉来异国他乡定居发展,从而成为国外华人的主体。

第二次移民潮开始于香港回归前,当时“香港基本法”虽然明确规定保持50年不变,但不少香港的富人还是心存疑虑,纷纷举家移民国外,但后来在看到香港回归后不仅社会稳定,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时,大多数人又移回了香港。中国内地移民潮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逐步展开的。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与此同时,社会的财富也在向少数人迅速聚集,于是产生了中国的新富一族。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便想方设法转移财富到国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移民潮。一些贪官为了能把赃款永久占有,也加入到了新的移民潮中。所以第二次移民潮的特点与第一次截然不同:不是输出劳力而是输出财富,不是个人外出打工而是举家移民。

(谭恕 整理)